

北京市基礎教育改革中的 政治衝突 (1954-1966)

● 曹子尼、董國強

摘要：1966年夏天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與持續多年、旨在整肅與重塑國家意識形態的狹義「文化革命」有着緊密的內在關聯，大、中、小學的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側重考察北京市基礎教育改革問題在中共幹部群體內部引發的爭議與衝突。〈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五四決定〉）是北京市委在1954年制定的關於教育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圍繞該決定的長期黨內紛爭主要涉及中央教育部官員、北京市委及市教育主管部門領導人、北京市各中學負責人三個群體。這些紛爭一方面折射出不同幹部群體對「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在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黨的系統與政府系統、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屬糾葛。〈五四決定〉在文革前夕遭到徹底否定，表明在基礎教育改革實踐中，務實考量最終被政治目標壓倒，經驗理性最終被意識形態偏見取代。

關鍵詞：北京市委 〈五四決定〉 教育改革 政治衝突 文化大革命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一直積極致力於通過國家意識形態的整肅與重塑來捍衛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小學教育是向青少年灌輸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整個基礎教育系統被置於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絕大多數中小學由黨員幹部擔任主要負責人，在教育方針、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等方面也有一些「革命化」的配套措施。然而，中小學教育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擔負着多種不同的社會職能，同時也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從19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多次提出並實施所謂「教學改革」或「教育革命」不難看出，當局對中小學教育的強力干預一方面實現了一些既定目標，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些始料不及的問題，甚至還引發了一些政治衝突——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文化大革命初

期，全國各地中小學生紛紛以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為名，向黨組織任命的學校領導層發起猛烈攻擊。

早在上世紀70、80年代，西方學者就對上述悖論的成因進行了較為宏觀的探討，初步揭示了當代中國基礎教育與國家政治干預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①。自上世紀末起，中國學者也開始涉足這方面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大躍進（1958）、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1965）和文革（1966-1976）期間「教育革命」對中小學教育造成的種種影響^②。還有一些中英文論著以廣州、北京等地為考察重點，進行了較為細緻深入的微觀實證研究^③。概而言之，上述論著的研究靈感大多源於文革初期的戲劇性衝突，着重考察中小學生群體的造反動機和派性起源，強調中共政權長期以來大力灌輸「階級鬥爭」觀念對青少年群體的影響。

不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許多教育改革措施，應該追溯到1954年出台的〈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五四決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定自出台以後就紛爭不斷，捲入紛爭的主要有中央教育部官員、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市委教育部和市教育局）負責人，以及北京市各中學校長三個群體。各方的爭執既涉及一些具體措施的得失，也涉及一些較為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主要包括如何理解「黨的一元化領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和「階級鬥爭」等概念。這些爭論往往以激烈的政治衝突告終，隨後又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死灰復燃。圍繞基礎教育問題的紛爭不僅發生於中學校園，還發生於中共官僚體制內部，而且其複雜成因和激烈程度遠遠超乎我們的預料。

本文主要依據檔案資料和其他歷史文獻，論述北京市委〈五四決定〉是在甚麼情況下出台的？它包含哪些具體內容和配套措施？如何因應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其側重和修辭？圍繞基礎教育改革的一些意見分歧如何逐步升級為政治衝突？北京市的基礎教育改革最終以何種方式結束？這樣的終結對中國的基礎教育帶來甚麼影響？

一 〈五四決定〉的出台及實施

1949年中共接管北平時，該市只有15所公立中學、61所私立中學、235所公立小學以及121所私立小學；在校學生數量約為16萬（另有10多萬學齡青少年因貧困和戰亂無法入學）。全市中小學教職員僅有6,000名，不僅數量上嚴重短缺，而且工資水平很低，難以維持生計^④。中共政權最初只接管了公立中小學，並試圖通過強化校舍管理、規定學生錄取和考核標準、控制教育資源等措施，肅清「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殘餘毒素」^⑤。但因各校專任教師和管理幹部數量嚴重不足，教學和管理水平十分低下，當局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沿襲民國時期的學制和教制。與此同時，為數眾多的私立中小學基本處於放任自流狀態。

1952年6月，北京市委就中小學教育中存在的辦學主體混亂、當局難以監管等問題向中央提交報告，主張接管所有私立學校。毛澤東隨即對該報告作出了肯定批示^⑥。9月初，中央教育部發布指示，要求「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⑦。10月底，北京市教育局接管了全部私立中學及六十所私立小學^⑧。此舉固然有利於強化中共政權對中小學教育的全面控制，但各校的辦學條件並未得到相應的改善。首先是許多學校校舍匱乏，只能暫以「二部制」方法應付。所謂「二部制」就是在教室不足的情況下，多個班級在不同時間節點到同一個教室上課。這在相當程度上造成排課混亂，直接影響到教學質量，但教育主管部門對此無可奈何^⑨。其次是教師數量嚴重不足。接管前，多數私立學校教師為了維持生計，無限制地到處兼課，因而教師負擔重，學生缺乏管理，教學秩序極為混亂。接管後，上述問題依然存在。此外，當時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也對中小學教學工作形成較大衝擊，造成學校領導和教師工作忙亂現象。儘管這個問題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北京日報》還為此刊發了多篇專欄討論文章，市教育局也試圖採取措施盡快解決該問題，但從1953年教育局的一份工作總結報告看，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⑩。

礙於上述原因，1953年北京市高考成績很差，有近70%的學生平均成績不合格，在華北四大城市（北京、天津、保定、太原）中位列第三；中考不合格率也在一半以上。另一方面，當年仍有近37,000名適齡學生不能進入小學和初中，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不滿，先後有四千餘名學生和家長到市教育局請願^⑪。

上述問題引起北京市委的高度關注。1954年初，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提出「要由市委來做出提高教育的決定」^⑫。隨後由楊伯箴（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孫國梁（市教育局黨員副局長，實際主持工作）、薛成業（市教育局黨員副局長）等人組成專門班子，負責起草「市委決定」初稿。2月下旬，彭真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要求各級黨委「注意研究提高教育質量」，還說「好的教員給予物質獎勵，特別好的薪金可以比別人多一倍、二倍、三倍，反對平均主義」^⑬。2月和3月，市教育局根據市委要求對中小學教育狀況進行了全面調查，並組織各校校長和教師座談會徵詢意見。一些教師在會上提出了加強業務學習、減少非教學活動、整頓教學秩序等建議。市教育局也結合北京各中學的現實情況，主張在「提高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規模」兩者之間優先考慮前者，並提議將中考和高考成績作為衡量各校教育質量的最重要標準。上述各方意見和主張，後來都被吸納到「市委決定」初稿中^⑭。

這裏有必要指出，當時北京市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具有普遍性。在北京市委草擬決定的同時，中央教育部也就這些問題展開研討，並向政務院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經政務院討論修訂，於1954年4月8日作為〈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以下簡稱〈政務院指示〉）下發全國各地。〈政務院指示〉一方面肯定了中共建政四年來在學校數量、學生數量、工農子女入學比例、男女生比例、教材改革、教學方法、師生政治思想、學生知識水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以下幾個突出問題：「高級中學還不能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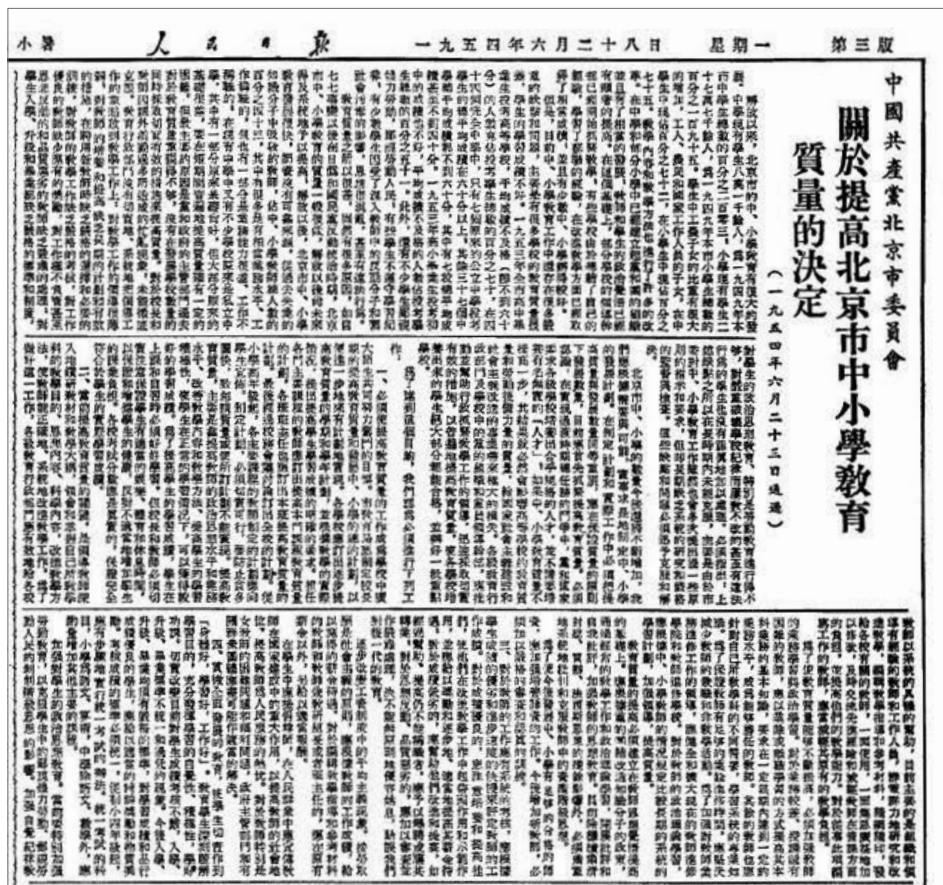
應高等學校以足夠的合格的學生；學生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都不夠高，體質還不夠健康；教學計劃和教材還不夠切合實際；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也不夠高；有些學校還缺乏領導骨幹，學校政治思想工作還差；對團結教師的工作注意不夠。」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政務院指示〉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除了強調「政治掛帥」和「正確的」意識形態灌輸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要點：第一，要根據需要與可能，積極地穩步地提高中學教育質量。第二，必須學習和吸收蘇聯的先進教育理論與教育經驗；要有計劃地修訂中學教學計劃，修改教學大綱和教科書，並為教師編輯一套教學指導書。第三，加強教師的文化與業務學習。第四，校長對學校工作應全面負責，但必須以領導教學為中心，使教學工作成為學校的中心任務；要處理好與教師的關係。第五，各級教育行政領導機關必須進一步加強對中學的領導；各地應有計劃地分批輪訓校長，對於尚缺領導骨幹的學校，要設法盡快配齊^⑮。

由於〈政務院指示〉發布在先，因此它實際上成為北京市委〈五四決定〉的重要模板。從這個意義上講，後來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負責人為該決定作出的種種辯護，確實有充分的理由（下詳）。當然，〈五四決定〉也加入了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針對本市具體情況作出的思考和決策，較為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更加注重提高教育質量——這當然也是為了提高北京市的高考和中考排名。

1954年6月23日，北京市委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五四決定〉，作為正式文件下發到各部門各單位，同時呈送中央領導人審閱^⑯。26日，市教育局召集各界代表會議，要求學習〈五四決定〉，重視中小學教育問題。28日，彭真出席上述會議並發表講話，強調必須堅決貫徹〈五四決定〉^⑰。同日，該決定在《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上全文公開發表，北京第四屆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作出了擁護該決定的決議^⑱。7月3日，《北京日報》刊發〈為提高北京市中學和小學的教育質量而鬥爭〉一文，要求大力宣傳貫徹〈五四決定〉^⑲。26日，北京市委就社會各界學習討論〈五四決定〉的情況向中共中央提交報告。8月29日，中共中央對該報告作出肯定批覆，並將其轉發全國各地參考^⑳。至此，〈五四決定〉成為一個得到中央高層認可的教育改革文件，並在全國範圍形成了廣泛的影響。

〈五四決定〉結合當時的歷史語境和社會各界的討論意見，將中小學教育改革工作凝練為六項：第一，提高教育質量是中心工作，各部門要制訂計劃；第二，領導教師提高業務能力；第三，確定教師考核標準，按表現分配工資，反對平均主義；第四，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第五，加強幹部的業務能力；第六，設立市委教育部，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㉑。後續的貫徹執行工作主要包括：

一、成立市委教育部，全面統籌貫徹執行〈五四決定〉、實施中小學教育改革工作。1954年12月，市委教育部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首任部長為廖沫沙（市委文委書記），副部長為楊伯箴^㉒。市教育局處於市人民委員會和市委教育部的雙重領導之下。二、選擇七所中學（北師大女附中、女一中、女四中、四中、二十六中、三十七中和四十中）作為試點單位，要求它們率先訂出



〈五四決定〉作為教育改革文件，在全國範圍形成了廣泛的影響。(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54年6月28日，第3版。)

提高教育質量的計劃，在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以便在全市範圍內逐步推廣。8月6日，這些學校向市教育局反饋了檢查教學質量的情況和改進後續工作的意見^{②③}。三、興辦師資培訓學校。8月，市裏新建了一所北京師範學院，同時將原有的教師進修學院改為「北京師範學院專修班」，大量開辦短期進修班，培養更多的基礎教育教師^{②④}。截至1955年1月，超過三分之一的中學教師和二分之一的小學教師參加了培訓，同時有750名應屆中學畢業生被訓練為後備師資^{②⑤}。四、在各校普遍建立教學工作制度，組織人手重新編寫中小學教材、教學計劃大綱和教學參考資料，實行統一考試，公布各校高考成績，給予高考平均成績合格的學校資金獎勵^{②⑥}。五、提高教師工資待遇，有80%至85%的教職員增加了薪資^{②⑦}。六、加強各校幹部配備。到1956年3月，市委累計向93所中學派出了301名中學校長和教導主任，其中黨員佔55%。至此，大部分學校「都有了黨員領導幹部」^{②⑧}。

上述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首先，1954年北京市的高考合格率不到15%，1955年這一數字大幅上升到67.4%，1957年北京市高考合格率更躍居華北四大城市之首^{②⑨}。其次，北京市的學校數量、學生數量和教職工數量也有了顯著增長，尤其是1954至1957年間，中學的數量呈現出成倍增長(表1)。另有數據顯示，從1954到1957年，北京市中小學教師共增加1萬人，超過1949年該市中小學全部教職員數量一倍以上^{③⑩}。

表1 北京市中小學情況，1952至1957年

類型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中學(所)	85	87	101	120	213	283
小學(所)	3,975	3,960	3,967	3,953	3,821	3,833
中學在校學生(人)	72,998	89,222	108,621	128,548	165,135	196,863
小學在校學生(人)	578,655	584,126	604,440	635,769	698,675	728,793
中學教職工(人)	5,640	7,398	8,754	9,235	10,718	12,805
小學教職工(人)	19,032	20,616	22,552	23,127	24,031	25,564
高考合格率(%)	—	21.73	14.36	67.39	42.69	52.41

資料來源：北京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1052-53；〈市委教育部組織中小學黨員幹部、教師討論「市委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參考材料〉(1958年7月)，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70，頁2、11-14。說明：與高考實行全國統考的辦法不同，這幾年北京市中學招生辦法幾次反覆，而且每年的實際錄取率主要取決於當年招生數量而非中考合格率，故本表略去了「中考合格率」一列。

二 不同意見的出現及其持續發酵

儘管在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看來，〈五四決定〉的頒布與實施成績斐然，但一些黨員幹部(包括許多重點學校的黨組織負責人和黨員校長)卻在各種場合對〈五四決定〉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因而許多學校的普通教師和學生也對該決定議論紛紛，致令其貫徹實施受到一定阻礙。不過，更具影響力的批評意見來自中央教育部。1954年11月，中央教育部派人赴各地視察。在北京，他們聽取了市教育局貫徹執行〈政務院指示〉的匯報，參觀了幾所學校，召開了若干座談會。視察結束後，中央教育部中學教育司召開內部討論會，肯定了遼寧、福建兩省的工作成績，但卻認為北京市工作上缺點較大，問題嚴重。中教司一位科長說：北京市教育局工作一套套地布置，但沒有思想領導，形式主義地解決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另一位中教司幹部甚至揚言，北京市工作不體面、不光彩，是全國教育界的一股逆流^①。

12月下旬，中央教育部召集北京等十二省市中學教育工作匯報會。副部長陳曾固在總結報告中批評北京市急躁冒進，在三個月內搞了八大工作(編教學資料、教師進修、統一招生、忠誠老實運動、整頓教師隊伍、統一考試、置辦託管所、訂提高教育質量計劃)，違反「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給相關工作添加了不少忙亂^②。

1955年，《人民教育》和《光明日報》陸續刊登文章，就如何正確理解「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如何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如何在中小學教育中突出「政治掛帥」、如何在提高教學質量的同時為學生減負等問題展開討論，指出當前中小學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亟需更正^③。由於上述文章作者中包括一批中央教育部官員，而且其觀點與此前中央教育部對北京市教育現狀的批評一脈相承，因此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負責人認為這是一次有

組織的「批評和攻擊」^{⑤4}。他們還斷言中央教育部的「不正常」反應，根源在於該部主要領導人認為提高教育質量的決定應該由他們下達；現在北京市委作出決定，徑直報請黨中央批准，完全無視中央教育部的存在，是違反科層化管理程序的錯誤做法^{⑤5}。

擇要說來，中央教育部對北京市的批評意見包括：一、學生課業負擔過重，作業多，考試多，分數低，學生過份疲憊，情緒低落，信心不足，健康狀況不好，嚴重地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二、學生的思想教育很差，學生學習目的性不明確，只想到個人的出路，看不見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三、學校領導核心不健全，團結改造知識份子政策貫徹差，教學領導的目的性不明確，放鬆了教師的政治、業務學習；四、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未受到應有的批判，各種唯心主義的教育觀點在提高教育質量的名義下重新抬頭，為學習而學習的思想有了市場，強迫學生死記硬背的教法有了合法地位^{⑤6}。不難理解，上述批評意見進一步加劇了北京市教育系統內部已有的意見分歧。

客觀地看，中央教育部與北京市委的意見分歧，既涉及中小學教育的行政權屬問題，也涉及思想觀念的差異和不同的政治考量。中央教育部從抽象的原則立場出發，更加強調「政治掛帥」和「全面發展」，忽略了一些客觀因素（如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基礎設施殘缺不全、幹部和教師嚴重匱乏）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北京市面臨的現實壓力（如每年高考全國排名）。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將一些具體措施的得當與否上升到違背「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忽視「政治掛帥」、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高度，當然引發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的嚴重不滿。

〈五四決定〉起草者之一、市教育局副局長孫國梁，在1954年底至1955年初兩度致信市委領導^{⑤7}。他在12月15日發出的第一封信中抱怨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直接影響到統一考試和編寫綱要資料等工作，認為市委教育部領導應該與對方當面交涉，據理力爭。在沒有得到答覆的情況下，他於次年1月8日再次致信市委領導，全文如下：

彭真、劉仁同志：

最近教育部開了個各省市的部分校長座談會，交流了經驗，最後陳副部長〔陳曾固〕作了總結，侯、彭司長〔中教司司長侯俊岩、副司長彭文〕發了言。一般的說對我們幫助很大，但是在話中可以聽的出來，對北京有些批評。其中有些也是很對的，也正是我們教育局的缺點，但有些是有原則分歧（？）的。這些分歧就是對我們的措施（？）有些不同意見，甚至拔高到原則（？）的最高度，認為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不同，是根本方針問題矛盾。這些意見已經在校長們思想中間起了一些問題，如何統一思想進行今後的工作呢？這個問題放在我們的面前，如不能與教育部經過討論達到統一，我們對下面就不好表示態度，也就不好進行工作。這問題請市委注意並給予指示原則。

此致敬禮

孫國梁 一月八日

1月9日，彭真在這封信上劃了幾處重點，打了幾個問號（見上文），並作出如下批語：「請劉〔仁〕告楊〔伯箴〕、孫〔國梁〕具體研究，對歸對，錯歸錯。」^⑳顯而易見，彭真也認為中央教育部小題大做，無限上綱。不過為顧全大局，北京市委和市委教育部並未對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作出反駁，而是在實際工作中堅持貫徹〈五四決定〉。市委教育部在隨後一份涉及〈五四決定〉的工作報告中，刻意淡化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突出強調教育改革的積極成果^㉑。8月，市委教育部負責人在一封致市委領導的信件中，依然主張採取積極措施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㉒。9月，市人委有關部門在一份工作報告中強調「本市中學學生70%以上的課業負擔是不重的」^㉓，實際上否定了中央教育部的說法。

北京市委的上述反應雖然在一些學校負責人中引發了「市委不尊重教育部」的議論，但大多數學校負責人站在了市委一邊，繼續宣傳貫徹〈五四決定〉^㉔。不過由於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後續工作並不盡如人意。首先是各校的校舍建設工作進展不大，只能繼續實行「二部制」。其次是教師數量依然不足，減輕教師負擔的倡議實際上成為具文。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學生正常的學習狀況便無法得到保證。此外，1955至1956年連續兩年擴大招生規模，又帶來了1957年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升學難」和「就業難」問題^㉕。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導致一些固有分歧以新的方式和新的修辭再次出現。

三 北京市委對不同意見的嚴厲打壓

為了應對「升學難」和「就業難」問題，各級政府動員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這招致了眾多學生及其家長的嚴重不滿。1957年春，全國各地都爆發了學生抗議活動^㉖。北京市的情況也不例外。1957年4月，市教育局負責人為中學畢業生做報告，要求他們對能否繼續升學持「正確的」態度。學生對此反應強烈，揚言「考不上學校砸教育局的牌子」。畢業生家長也紛紛給政府寫信，對子女不能升學、不能就業頗有怨言，但各級政府確實無能為力。1957年上半年，北京市的學生抗議事件不斷增加^㉗。由於學潮分散了北京市委領導的注意力，因此他們無暇顧及〈五四決定〉的貫徹執行。而部分學校的領導層或許感覺到來自市委壓力的放鬆，又或是本來就對教育資源向少數試點學校傾斜不滿，對貫徹執行〈五四決定〉的態度更為消極。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各校幹部、教師中的一些不同意見也在毛澤東大力鼓動的「鳴放」中浮出水面。

1957年1月北京市委在一份內部文件中，將種種現實問題歸因於〈五四決定〉中「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的規定沒有得到切實貫徹，各級黨組織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領導和監督作用^㉘。他們還將來自中央教育部和基層單位的不同意見視為對〈五四決定〉的攻擊。1957年夏天以後不斷高漲的反右運動以及1958年以後的「反右運動補課」，為北京市委打壓不同意見提供了契機。

如前所述，1955至1956年之所以沒有爆發公開爭論，主要是因為北京市委顧忌與中央教育部的關係。當時的中央教育部部長是黨外人士張奚若，而

實權人物是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董純才。董純才(1905-1990)，湖北大冶人，早年在光華大學接受教育，在1930年代初期成為著名科普作家、翻譯家和教育家。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入黨並長期從事黨的教育工作。1953年起擔任現職，同時兼任中央教育行政學院院長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他主持起草了1953年政務院〈關於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其教育理念深受蘇聯著名教育家凱洛夫(Ivan A. Kairov)等人的影響^⑦。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出現分歧，毛澤東轉而強調以蘇為鑒，蘇聯經驗開始遭到質疑。

1958年4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文教工作會議，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大會上做了主題報告。中央教育部被指「教條主義很嚴重」、「搬資產階級教條」，董純才遭到點名批判^⑧。此後，中宣部進一步強化了對教育工作的全面領導。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負責人早先對中央教育部批評意見的種種看法，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成為「正確」主張。他們決定利用對董純才的批判，打壓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中學黨組織和黨員校長。

4月27日，即中央文教工作會議結束後第三天，市委教育部部長廖沫沙召集部分校長舉行會議，宣稱這是一次關於〈五四決定〉的「缺點討論會」，希望將持續多年的分歧意見敞開談，但他隨後的長篇講話實際上為這次討論會定下了基調。他首先回顧了中央教育部主持的考察和幾次討論會議，以及各校校長中不同意見的出現，指出〈五四決定〉尚未經過實踐檢驗就遭到嚴厲批評，北京市各中學匯報會不邀請市委參加，匯報會上的批評意見很快在各中學快速傳播，都是不正常的情況。他還將各種不同意見(尤其是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上升到「反對黨的領導」的高度：

決定是市委作的，地方黨委能不能做這樣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誰領導的，不管，連黨員也不管這些，這是為甚麼呢？一句話總結，是黨不能領導教育。誰能領導教育呢？教育部的一部分人嗎？

他還就「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突出政治」、「思想領導」、「學生負擔」、「統一考試」、「各校高考成績排名」、「教學計劃綱要」、「工作制度」八個問題，為〈五四決定〉及其配套措施進行了全面辯護。他將所有錯誤言論的根源都歸咎於董純才，斷言1954年底中央教育部官員批評〈五四決定〉是一場政治陰謀^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這次會議的匯報材料中，至少記錄匯總了十二位校長針對廖沫沙上述講話的批評發言。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他們指出「廖部長說五四年中央教育部中學教育會議的精神，是有組織地散播」不符合事實。他們辯稱各校校長的一些意見，如〈五四決定〉的具體措施偏重於知識質量，一切為了考大學；對師資標準只提資歷、學歷和工作經驗，不提政治思想；通過統一考試評比，給各校排名次，等等，都是就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感而發，與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沒有直接關聯；而且對相關工作提出一些批評意見，並不意味着反對黨的領導。第二，他們認為在如何理解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問題上，廖沫沙不應該將〈政務院指示〉中

提到的「五育」(德、智、體、美、勞教育)和毛澤東後來倡導的「三好」(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對立起來。「五育」是根據蘇聯經驗提出來的,廖沫沙不應該為了打倒董純才,就全面否定蘇聯的教育方針。這不符合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精神^⑤。

針對各校校長同廖沫沙的意見分歧,為統一思想認識,市委和市教育局主管部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開展了三項工作:

第一,市委組織人手整理、印發了有關〈五四決定〉的參考材料。這份長達三十七頁的文件鉅細無遺地羅列了〈五四決定〉頒布以來的教育改革成果(例如教學質量得到了顯著提升,以及學生數量、教職員數量、考試成績、學生健康衛生狀況等方面的進步),意在表明該決定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都是無可指摘的。但它也刻意迴避了一些缺點和不足^⑥。

第二,市委教育部向各區發出指示,要求組織各校黨員領導幹部討論〈五四決定〉。這場大規模的討論從1958年7月中旬開始,到8月底基本結束。參加討論的最初僅限於學校的黨支部(或總支)委員和黨員正、副校長,以後逐漸擴大到全體教職員中的黨員。各區討論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海淀區分歧較多,爭論較激烈;朝陽區、豐台區和昌平區爭論不多,很快結束。初期存在三種不同意見:一、基本否定〈五四決定〉,認為該決定沒有突出「政治掛帥」,對教育和教學的看法是資產階級的看法,對北京市教育工作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二、認為市委決定是正確的,指導思想是全面的,幾年來貫徹的結果成績很大;執行中產生過一些缺點和問題,主要是各校領導對決定的理解或貫徹存在偏差。三、認為市委決定基本上是正確的、全面的,但也有些缺點。後來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絕大多數黨員幹部都轉到擁護市委決定的一方;少數反對市委決定的黨員幹部都作了檢討;只有個別人士固執己見,拒不承認錯誤^⑦。

第三,9月下旬,市委教育部向市委提交了一個總結報告,系統回顧了〈五四決定〉起草的過程,匯總了各種爭議觀點並分析了產生爭議的原因,主要包括:(1)「思想認識的片面性」;(2)「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3)「以專家自居排斥黨的領導」等。該報告還斷言少數人認為市委決定「有方針性的錯誤」,「使教育工作走了很大彎路」,這不是一般的意見分歧,而是一場大是大非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黨能不能領導教育。該報告最後建議,「一些錯誤嚴重的黨員,應該受到處分」^⑧。結果,張迅如(東城區區委副書記、區委教育部長兼六十五中校長)被劃為「右派」,胡志濤(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被定為「反黨」,楊濱(四中黨總支書記兼校長)被定為「右傾」;十一人受到黨內處分,三十三人被重點批判^⑨。

張迅如(1919-1989)出身於廣東富商家庭,讀中學時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8年赴延安,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學習並入黨。後來赴山東參加抗日鬥爭,左臂重傷殘疾。1949年調北平工作。〈五四決定〉出台時,他是東城區區委副書記兼區委教育部長(1957年兼任六十五中校長)。他成為重點打擊目標,主要是因為他1954年底參加了中央教育部召集的十二省市工作匯報會,在發言中反對統一考試、分數排名,主張為老師和學

生減負。1956年市委就〈五四決定〉召集專題討論會時，他又當面頂撞了市委和市教育局負責人。1958年夏秋市委指示各區組織關於〈五四決定〉的大討論，東城區動作遲緩，兩種意見爭論激烈，顯然與他作為區委教育部長的態度有關。所以1958年市委決定將他劃為「右派」，藉以震懾其他持不同意見者。他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後，行政降兩級，發配郊區農場勞改三年。1961年成為「摘帽右派」，1962年被任命為二十七中副校長^⑤。

胡志濤(1920-1995)是浙江人，接受過中學教育。抗日戰爭期間入黨，赴山西從事宣傳工作。1946年在解放區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參與北平接管，先後擔任北師大女附中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副校長、總支書記。1954年底她作為中央教育部委派的巡視員，對〈五四決定〉及其配套措施發表了許多批評意見。這次被定為「反黨」，行政降兩級，下放工廠勞動。1962年獲得平反，恢復原來職務^⑥。

楊濱(1917-1981)是山東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1938年奔赴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同年入黨。後來在陝甘寧邊區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教育局中教科股長兼科黨支部組委、北京市女一中書記兼校長、四中書記兼校長。1954年底被中央教育部任命為巡視組負責人。因一直批評〈五四決定〉，在1958年被定為「右傾」。1962年獲得平反，調女九中工作^⑦。

從上述三人的具體情況看，北京市委與部分中學負責人的紛爭是北京市委與中央教育部紛爭的延續，受到嚴重處理的中學負責人都對〈五四決定〉持批評態度。

四 中學教育改革的左右搖擺

經過1958年的大力整肅，〈五四決定〉得到確認。但由於中共高層的政策導向多次反覆，所以北京市的中學教育改革一直在「政治正確」和「經驗理性」之間左右搖擺。

1958年4月15日，陸定一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教育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要為政治和生產服務，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8月16日，《紅旗》刊載陸定一的文章，重申上述教育方針。10月31日，中宣部向全國批轉江西省委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由此形成一個「教育大革命」高潮^⑧。

儘管上述激進主張在許多方面與〈五四決定〉相互抵牾，但北京市在此前後不得不順應政治形勢的變化，出台了多項新的措施。2月16日，共青團北京市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反右鬥爭取得勝利後「要有一個新的躍進」，要加強學生「政治思想教育和勞動生產教育」。3月8日，市委教育部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要在基礎教育方面貫徹「多、快、好、省」方針。6月1日，市人委召開會議，決定進一步普及中小學教育，要「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5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大辦教育，辦小學，辦中學……能辦甚麼就辦甚麼」^⑨。市委還推出了鼓勵中小學師生參加體力勞動的措施。到10月，全市已經有80%

的中學生以每周六分之一的時間參與工農業生產。此外，市委還組織人手研究如何縮短學制、精簡人員，以滿足「多、快、好、省」的要求^⑥。

大躍進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嚴重惡果，1958年秋冬中央領導人開始考慮降溫。北京市緊跟中央部署，在11月回調了一些過激的「教育革命」措施，包括減少學生勞動時間和保證九小時休息^⑦。1959年1月，市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停止所有「半工半讀」試驗^⑧。5月10日，《北京日報》刊發一位中學教師的文章，再次呼籲「提高教育質量」^⑨。但這些措施很難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1959年北京市高考成績遠遜福建，落居全國第四^⑩。北京市委再次面臨與1957年春類似的社會壓力。

1959年8月中旬，市委教育部在西苑大旅社召開中小學教育工作會議。這次會議重申了〈五四決定〉的正確性，指出當前工作要轉到「建立和鞏固正常的教學秩序」上來。新任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大會發言中強調，「學校的主要活動是教學，從時間上看佔最大量，學校是受教育的地方，當然要以教學為主」。他還傳達了市委的指示，要求各校在方興未艾的反右傾運動中以正面教育為主，不搞「人人過關、個個檢討」。不久前調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文教工作的鄧拓，在會議總結報告中指出：「提高質量是長期的任務，一個學期不成，起碼得一、兩年才開始出現效果，要長期努力，才能取得成績。……要按照教學工作的特點辦教育，急躁會得到相反的結果。」^⑪

為了提升北京市高考成績排名，市委教育部提出了「抓高三趕福建」口號。10月9日，市委教育部召開各區文教書記和教育部長會議。張文松要求與會者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孫國梁（時任市教育局局長）在發言中強調：「高考提高質量已成為當前迫切嚴重的任務」，要注重提升高三畢業班的成績^⑫。28日，鄧拓召集全市教育系統領導幹部開會，批評幹部對教育「抓得不緊」，敦促他們大力加強畢業班工作，積極提高教學質量^⑬。各區各校隨即層層部署，以「反右傾、鼓幹勁」為口號，對高三年級的教學和管理工作作出重大調整，將有經驗的教師全部集中到高三，並讓所有高三學生住校學習，不參加任何體力勞動。各校還定出升學指標，按考試成績劃分名次，強化激勵機制。儘管這些措施在各校師生中引發了一些爭議，而且中宣部在1960年4月重申要「縮短學制、增加勞動」^⑭，但市委教育部不為所動，只是不再公開高調提出「抓高三趕福建」的口號^⑮。結果，1960年北京市高考合格率近90%，達到幾年來的峰值^⑯。雖然市委教育部負責人一再強調，高考成績好是因為教學改革起到了關鍵作用^⑰，但有論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1957年各中學大規模縮減招生，使得高考人數與高校錄取名額趨於平衡^⑱。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裏，較為務實的教育改革措施繼續佔據主導地位。1960年11月，市委教育部提出了關於勞逸安排問題的「十項要求」，對中小學生的學習時數、作業和考試負擔、教師八小時工作制、晚間會議學習、師生睡眠時間、周末休息時間、體育活動安排、學生參加勞動、學生食宿安排和課外活動管理問題都做出了明確規定，並責成各校指派一位主要領導負責督促實施。具體內容涉及：減輕教師工作壓力和學生學習壓力；減少政治

會議和學習；保障師生睡眠時間；不准佔據師生星期六和星期天；學校一律不許自行安排義務勞動；下鄉勞動的學生立即調回，等等^③。1961年4月，鄧拓在全市中小學黨員領導幹部會議上指出，在教育領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心環節是「提高教育質量」^④。暑假期間，市委將本市學制改革試點進一步減少為小學六校、中學二校，其他學校都回歸舊學制^⑤。11月下旬，市委發布關於中小學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指出「提高教育質量是一項長期的、具體的工作」。此外，市委還採取了一些措施化解反右運動造成的消極影響^⑥。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對1958年大躍進和1960年「持續躍進」作出了更加深刻的反省，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針。這與北京市在教育工作中的務實做法相互契合。不過，這次大會上關於「黨內民主」問題的熱烈討論，尤其是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也帶來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後果。3月5日，北京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4月中旬，市委教育部召集中學校長會議，討論「黨的生活問題」。一些在1958年遭到整肅的中學校長舊事重提，強調市教育局指責部分校長「私通教育部」不實，引發了一些爭論。但由於幾位涉及此事的領導幹部張文松、廖沫沙、楊伯箴等主動在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主要責任，並在會議間歇與胡志濤、楊濱等曾經的受害者進行了私下溝通，所以並未形成新的公開對抗。而性格偏執、在自我批評發言中抵觸情緒明顯的孫國梁，也在張文松等人的規勸下有所收斂^⑦。大多數受過處分的校長都得到了較為妥善的重新安置。此後，北京市針對前幾年出台的一些浮誇計劃作出切實調整，精簡教職員人數，縮小學校規模，同時採取措施克服「教育大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⑧。教育改革似乎重新回到〈五四決定〉正軌。

然而，七千人大會帶來的正面效應並未維持多久。1962年夏天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導致政治局勢驟然升溫。1963年春，毛又發動了一場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小學教育也受到嚴重波及。中央政策的反覆無常使北京市委和市教育局無所適從。3月，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一份報告，提到學習「反修」資料擠壓了學生學習各科課程的時間，「衝亂經常的教學工作」，希望中央重新考慮^⑨。4月，市委教育部不得不因應新的政治形勢，要求各中學開展「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試點，但同時強調要「實事求是，有甚麼反甚麼，有多少反多少。不貼大字報，不開鬥爭會，不組織學生在會上面對面揭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現象」^⑩。6月，市委請示中央和華北局，為了不影響教學工作，不打算在全市範圍推廣學校「五反」試點經驗，只在各校進行正面教育^⑪。後來或許是因為受到中央的壓力，市委在7月召集全市教育系統三級幹部會議，號召中學幹部學習中央文件，提高對「階級鬥爭形勢」的認識，積極投身於「五反」運動^⑫。但從11月下旬一份市委工作報告看，中學領導幹部對如何開展「五反」運動意見紛紛，熱情不高^⑬。他們並不知道，「五反」僅僅是一系列更為激進的政治運動的序幕。

五 〈五四決定〉遭到徹底否定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4和1965年不斷掀起新的高潮，中央高層對文教工作的直接干預有增無已。1964年2月，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再次批評現行教育制度，說現在「課多、書多，害死人」，考試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他主張「學制、課程、教法、考試辦法都要改」，課程要「削一半」，考試要改變方式，「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他還說學生「不勞動不行，不要老住在城裏」^④。3月7日，陸定一在全國教育廳局長會議上傳達了毛的談話內容，一再強調教育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接班人」。各地辦教育要堅持這個方針，實現教育的「革命化」^⑤。幾天後，毛又將《群眾反映》上刊登的一位北京市中學校長關於「減負」問題的信件批轉中宣部和中央教育部，在批語中重申了他對教育現狀的批評^⑥。於是，一場新的「教育革命」迅速在全國範圍鋪開。

在上述背景下，北京市不得不緊跟形勢變化，重新部署中學教育改革工作，但當時出現的一些新情況使得北京市委和市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舉步維艱，進退維谷。

首先，參與〈五四決定〉起草、捍衛該決議最堅決的市教育局局長孫國梁，因個人性格偏執、工作作風強硬招致各方不滿，被市委解除職務。他的繼任者是北京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李晨^⑦。但李晨進入教育系統時間很短，過去長期擔任石景山區區委書記、市總工會秘書長等職，對中學教育改革工作並不熟悉。而一度捲入教育改革紛爭的原市委教育部部長廖沫沙和副部長楊伯箴，早已於1958年底調任其他職務；與〈五四決定〉有些淵源的時任市委教育部部長張文松，實際上孤掌難鳴。

其次，毛澤東繼續大力推動「教育革命」。1964年7月初他和侄子毛遠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談話，強調「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⑧。北京市委聞風而動，市委教育部在7月下旬的一份報告中提到，打算從該年秋季開始進行為期一年的改革試驗，「狠抓教學改革和勞動落實」^⑨。但毛對這種自上而下領導的教育改革實驗並不認同。他對王海容（毛的姨表兄王季範的孫女，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說：「甚麼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你就帶頭造反！」^⑩

再次，「教育革命」成為中學校園裏的熱門話題，「紅」與「專」的爭論空前激烈，一些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政治姿態愈來愈激進。就連少數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也聞風而動，對現行教育改革措施提出種種批評和指責，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政治積分」。因而，〈五四決定〉中的一些務實內容（如強調教學質量和升學率）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1965年4月下旬，李晨向市委教育部提交報告，建議放棄〈五四決定〉中關於附加工資等若干規定，市委常委會在討論該報告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⑪。這是文革爆發前北京市委最後一次在工作會議上討論〈五四決定〉。

1966年4月，北京市長彭真（同時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因〈二月提綱〉等問題遭到批判。5月，鄧拓和廖沫沙等人因「三家村」問題受到衝擊。6月20日，《北京日報》刊登社論，指斥「舊市委」極力反對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妄圖「培養資產階級的接班人」^②。7月29日，張文松在《北京日報》上遭到點名批判，指其「推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在中小學教育路線上扯起了一面黑旗」^③。在譴責「舊市委」的話語體系中，〈五四決定〉被指犯下了「智育第一」、「業務掛帥」、「校長負責制」等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貫徹執行該決定較為得力的學校被視作「修正主義大染缸」，中央批轉〈五四決定〉的決定被斥為劉少奇、鄧小平的「黑指示」^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曾經批評〈五四決定〉的黨員幹部也未能逃脫文革的暴風驟雨，與那些曾經捍衛該決定的人一同受到批判。已經離職休養的原中央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被扣上「中國凱洛夫」和「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帽子受到嚴厲批判，後來又被造反派抄家、毆打、關進「牛棚」，完全失去人身自由^⑤。楊濱在張文松、孫國梁等人遭到北京四中激進學生批鬥時，被當作他們的「爪牙」陪鬥。胡志濤在北師大女附中遭到激進學生批鬥毆打，還被遊街示眾。因反對〈五四決定〉在1958年遭受打擊最重的張迅如，在文革初期貼出三張大字報炮轟「舊市委」，為自己爭取到了暫時的平反。但數月後他又因「企圖翻案」遭到更為殘酷的鬥爭，被關押六年，幾近自殺^⑥。

六 結論

在通盤檢視〈五四決定〉以及由它引發的政治衝突後，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這場持續十多年的政治衝突既涉及黨的系統與政府系統、中央與地方的權屬問題，也涉及中共黨員幹部群體內部的思想觀念差異和不同的現實利害考量。而不期而至的一場又一場全局性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整風鳴放和反右運動、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又對衝突的持續與激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中共建政以後，必然要採取種種措施來鞏固政權。在嚴厲鎮壓各種敵對勢力、不斷強化社會控制的同時，順應社會各界的願望和訴求，大力發展各項社會事業，是取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對各級各類學校的接收、改造和後續發展，也是服務於上述政治目標的。北京市委〈五四決定〉的提出與實施，一方面旨在向中小學師生灌輸主流意識形態，實現國家意志向基礎教育領域的滲透，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另一方面是要促進教育事業發展，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滿足廣大學生及其家長的升學願望。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在該決定出台之前，中央政務院曾經發布過一個主旨和內容十分相近的指示；該決定出台之後，又很快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並批轉全國參考。這說明該決定既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導向，也帶有很強的務實的經驗理性色彩。

第三，不同意見和政治紛爭的出現，源於在貫徹實施〈五四決定〉的過程中遇到了種種現實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是由於中小學數量不足、基礎設施落後、領導幹部和教師嚴重短缺、學校管理水平低下、學生升學壓力大，因此難以實現「又紅又專」和「德、智、體全面發展」等既定目標。而頻繁的、目標多元的政治運動，也對學校日常工作帶來嚴重衝擊，造成所謂「忙亂」現象。在升學問題引發社會各界強烈不滿的情況下，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不將「提高教育質量」（也是為提高北京市的高考全國排名）作為教育改革工作重點，結果招致中央教育部的猛烈批評。在辦學資源嚴重匱乏的現實狀況下，市教育主管部門不得不將有限資源向少數「重點學校」傾斜，又引發了「非重點學校」領導和師生的嚴重不滿。

第四，本文論述的意見分歧和政治衝突主要發生在各級黨員幹部之間。中央教育部官員、北京市委和市教育主管部門（市委教育部和市教育局）負責人和各中學領導幹部，由於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直接面臨的問題不同，對中央教育方針的認識不同，因而在工作中存在意見分歧並不難理解。這說明幹部的政策偏好與他們所處的特定地位有關。概要說來，中央教育部只需提出一些原則性的指導方針，不必處理具體的實際問題，所以更傾向於強調「思想領導」和「全面發展」。北京市委和市教育主管部門直接面臨現實困難和社會壓力，所以更傾向於強調「提高教育質量」。各中學領導層既要直接處理基層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又要應對來自中央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兩方面的壓力，當然也會有許多不同意見。從本文敘述看，他們一般會根據自己對中央教育方針和科層化組織關係的理解，來確定自己的基本立場。

但是，意見分歧為何會升級為政治衝突，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首先，導致政治衝突的最重要因素是「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表面看來，「黨的一元化領導」是一個簡單明確的概念（尤其是對「黨」與「非黨」關係而言），但由於中共官僚體制的內部構造十分複雜，因此「一元化領導」的實際權屬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中央教育部官員對北京市教育改革工作指手畫腳，顯然是將自己視為黨在全國教育戰線的代言人。而北京市委領導人則認為只有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才是「一元化領導」的真正載體，所以他們對中央教育部的批評意見置若罔聞。其次，「一元化」意味着不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各種意見的正確與否，實際上取決於各級黨委「一把手」的主觀判斷；而且為了壓制不同意見，自認為大權在握的一方往往會對不同意見無限上綱，將其定性為「思想鬥爭」、「路線鬥爭」乃至於「階級鬥爭」，這當然會招致受壓一方的強烈抵觸。他們為了捍衛自己的不同意見和政治生命，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一些關於具體工作的不同意見就會逐漸升級為政治衝突。再次，「一元化」意味着捲入衝突的雙方都沒有可能全身而退，失敗的一方最終會淪為政治犧牲品。所以衝突一旦形成，衝突雙方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利用宏觀政治局勢的變化而反覆纏鬥，導致衝突的長期延續和不斷激化。由此可見，衝突雙方共享的思想資源和話語體系（其核心要義是「一元化領導」和「階級鬥爭」），恰恰是導致矛盾衝突的癥結所在。

第五，從1954年到文革爆發前夕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北京市教育改革的左右搖擺，直接受到不同階段中央政策導向的影響，毛澤東的個人看法發揮着愈來愈重要的主導作用。然而，從文中引述的內容看，他對教育問題的看法過於簡單，帶有很強的個人偏見，所追求的目標完全不切實際。〈五四決定〉遭到徹底否定，表明在基礎教育改革實踐中，務實考量最終被政治目標壓倒，經驗理性最終被意識形態偏見取代。

註釋

① 如 Julia Kwong, *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zanne Pepper, "Education for the New Orde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5-217。

② 如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程晉寬：《「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李慶剛：《「大躍進」時期「教育革命」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劉小萌：〈文革前的「階級路線」問題——以學校教育為中心的觀察〉，《記憶》，第110期（2014年3月），https://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_No110.pdf，頁3-29。

③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5)；李晨主編：《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柯小衛：《當代北京教育史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隋子輝：〈「無產階級政治」指導下的北京市中小學教育（1949-1966年）〉（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論文，2012）；楊雋：〈北京老紅衛兵起源及興衰研究（1964-1967.1）〉（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④ 北京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1；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教育卷·基礎教育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頁210。

⑤ 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編：《北京市教育概況》（北京：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1949），頁1。

⑥ 〈對北京市委關於中小學生費用負擔情況的報告的批語〉（1952年6月1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71。

⑦ 〈教育部關於接辦私立中小學的指示〉（1952年9月1日），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164。

⑧⑨ 北京教育志叢書編委會編：《北京教育60年》（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9），頁36；54。

⑩ 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中學實行二部制的初步總結〉（1952年10月30日），載北京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北京市檔案館編研處編：《北京教育檔案文粹》，中冊（北京：華藝出版社，2008），頁975-79。

- ⑩ 《北京教育60年》，頁38；《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頁54。
- ⑪ 《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頁6；柯小衛：《當代北京教育史話》，頁73；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二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43。
- ⑫ 《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頁6。
- ⑬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1902-1997)》，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443。
- ⑭⑮⑯⑰ 《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頁97-98；97-98；102；190-92。
- ⑱ 〈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1954年4月8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305-307。
- ⑲ 翁獨健：〈關於中學和小學教育問題的報告〉（1954年6月26日）、彭真：〈提高教育質量 把學校辦好〉（1954年6月28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頁345-57、362-64。
- ⑳ 〈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學和小學教育質量問題的決議〉（1954年6月28日通過），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年)》，頁358-59；〈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人民日報》，1954年6月28日，第3版；〈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 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北京日報》，1954年6月28日，第1版。
- ㉑ 〈為提高北京市中學和小學的教育質量而鬥爭〉，《北京日報》，1954年7月3日，第1版。
- ㉒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4年7月26日），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年)》，頁414-22。
- ㉓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第3版。
- ㉔ 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北京市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257。
- ㉕ 《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頁1066；姚思源：〈前北京教師進修學院的音樂教學、教研工作回顧〉，載北京教育學院編：《薪火心傳：北京教育學院老教育工作者憶往筆談》（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頁70。
- ㉖⑲⑳ 〈關於執行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決議的報告(草案)〉（1955年1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27，頁1-12。
- ㉗ 〈北京市關於中學領導幹部配備的初步規劃(草稿)〉（1956年3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34，頁27-32。
- ㉘ 《北京志·教育卷·基礎教育志》，頁210。
- ㉙ 〈關於中小學師資問題的報告〉（1960年9月17日），北京市檔案館，153-004-00089，頁17。
- ㉚ 〈市委教育部關於組織中小學黨員幹部、教員討論「市委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情況向市委的報告及總結(初稿)〉（1958年9月17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69，頁9-10；《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頁114-15。
- ㉛⑳㉜㉝㉞㉟ 〈市委教育部關於組織中小學黨員幹部、教員討論「市委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情況向市委的報告及總結(初稿)〉，頁3-16；14-15；3-16；1-2、20-36；1-2。
- ㊱ 例如：〈積極地穩步地提高教育質量是今後普通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人民教育》，1955年第1期，頁5-7；丁丁：〈不要把中學教育引上歧途〉，《人民教育》，1955年第6期，頁36-39；侯俊岩：〈當前中學教育工作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人民教育》，1955年第8期，頁22-26；丁丁：〈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工作中的問題和改進意見〉，《光明日報》，1955年10月12日，第2版。

③④⑤⑥ 〈廖沫沙同志在中央召開文教會議期間向本市部分校長作的「市委關於提高教育質量的決定」的發言提綱及對此發言的反應向陳鵬同志的匯報〉（1958年4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67，頁1-4；1-4；7-21。

③⑦ 〈孫國梁致彭真、劉仁信件〉（1954年12月15日）、〈孫國梁致彭真、劉仁信件〉（1955年1月8日），《市委辦公廳關於檢查執行「市委關於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通知和廖沫沙、孫國梁同志給彭真、劉仁同志的信、廖沫沙同志關於區文教科機構、幹部同文教局的關係問題給劉仁、陳鵬同志的信》，北京市檔案館，001-006-01071，頁20、23。信件標題為筆者自訂。

③⑧ 彭真的批註，參見〈孫國梁致彭真、劉仁信件〉（1955年1月9日），《市委辦公廳關於檢查執行「市委關於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通知和廖沫沙、孫國梁同志給彭真、劉仁同志的信、廖沫沙同志關於區文教科機構、幹部同文教局的關係問題給劉仁、陳鵬同志的信》，頁23。

③⑨ 〈廖沫沙同志對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問題給劉仁同志的信〉（1955年8月30日），《市委辦公廳關於檢查執行「市委關於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通知和廖沫沙、孫國梁同志給彭真、劉仁同志的信、廖沫沙同志關於區文教科機構、幹部同文教局的關係問題給劉仁、陳鵬同志的信》，頁5-6。

③⑩ 轉引自《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頁120。

③⑪ 〈廖沫沙同志在中央召開文教會議期間向本市部分校長作的「市委關於提高教育質量的決定」的發言提綱及對此發言的反應向陳鵬同志的匯報〉，頁1-4；〈師大附中關於提高教育質量工作的檢查報告〉（1955年10月），載北京師大附中編：《北京師大附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頁319。

③⑫ 〈關於中、小學教育的報告〉（1959年8月11日），載《北京教育檔案文粹》，中冊，頁693；〈關於進一步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報告（七稿）〉（1957年），北京市檔案館，153-004-00067，頁102-103。

③⑬ 谷彥梅、董國強：〈1957年江蘇某些地區中小學反右派運動初探〉，《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2期，頁89-96。

③⑭ 〈應屆中學畢業生和中學教員對今年畢業生不能全部升學問題的反映〉（1957年4月27日）、〈人民來信來訪摘要：中、小學畢業生考不上學校找不到工作怎麼辦〉（1957年8月29日），《情況匯報（1049-1108）》，北京市檔案館，002-009-00230，頁68-70、95；〈1-7月群眾集體鬧事簡況〉，北京市檔案館，002-009-00231，頁110。

③⑮ 〈關於在中學、小學、中等專業學校黨的基層組織中實施領導、監督行政機構和群眾組織的任務的幾點意見〉（1957年1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47，頁1-5。

③⑯ 方曉東等：《董純才傳》（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2），頁1-2；〈革命教育家——董純才〉（2012年1月18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網，www.mj.org.cn/hszl/hsgc/201911/t20191125_101243.htm。

③⑰⑱ 方曉東等：《董純才傳》，頁150；154。

③⑲ 例如，北京市委迴避了學校規模擴張與教育質量提高的關係問題。參見〈市委教育部組織中小學黨員幹部、教師討論「市委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決定」的參考材料〉（1958年7月），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070，頁1-37。

③⑳ 《北京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頁148；胡志濤：〈日記〉（1994年1月26日），載韓靜主編：《愛滿天下 樂育英才：胡志濤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頁170；米桂山主編：《北京二中史略（斷代：1910-1966）》（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頁99。

③㉑ 〈張文松、楊伯箴、孫國梁等同志在1962年4月市委擴大會議中學組會議上的發言及中學組討論時提出的意見〉（1962年4月13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250，頁48-54；張迅如：〈憤怒控訴舊北京市委對我的政治迫害〉，《井岡紅旗（鬥批改專刊）》（中學紅代會西城委員會《井岡紅旗》編輯部、北京三中井岡山兵團鬥批改聯絡站合辦，內部資料，1967），頁9；張亞平：〈我的父親張迅如〉（2013年5月31日），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離退休工作處網，<https://ltx.cueb.edu.cn/jsyg/zpxs/31407.htm>。

- ⑤⑥ 劉秀瑩：〈堅強·執著·奉獻——憶敬愛的胡志濤校長〉，《教育藝術》，2007年第2期，頁36-38。
- ⑤⑦ 楊觀武、劉樹泉：〈楊濱傳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陽信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陽信文史資料》，第四輯（濱州：內部資料，1989），頁103-108；〈楊濱：陽信走出的優秀教育家、北京四中原校長〉（2016年7月26日），濱州歷史網，www.binzhouw.com/app/detail/244/1732.html。
- ⑤⑧ 〈陸定一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15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822-25；〈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人民日報》，1958年9月2日，第2版；〈中央宣傳部轉發江西省委「關於宣傳與黨的教育工作方針」進行教育大革命的指示〉，《中共中央教育部關於教育工作的通報》（1958年10月31日），001-023-00063，北京市檔案館，頁1-6。
- ⑤⑨ 〈中學團的工作、學生勤工儉學計劃、調查報告簡報〉（1958年2月16日），北京市檔案館，100-001-00524，頁5-18；〈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關於貫徹社會主義教育方針、促進教育事業的大躍進的報告提綱〉（1958年3月8日），載《北京教育檔案文粹》，上冊，頁158-69；《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頁10。
- ⑥⑩ 〈北京市教育規劃、附件、資料及市委教育規劃小組簡報〉（1958年10月），北京市檔案館，001-022-00351，頁65-69。
- ⑥⑪ 〈中共北京市委批發市教育局黨組關於妥善安排中小學學習和勞動問題的報告〉（1958年11月29日），載《北京教育檔案文粹》，中冊，頁669-70。
- ⑥⑫ 〈中共北京市委會議紀要〉（1959年1月13日），北京市檔案館，153-004-02744，頁6-8。
- ⑥⑬ 張子鐸：〈怎樣提高教育質量〉，《北京日報》，1959年5月10日，第2版。
- ⑥⑭⑮ 〈會議主要內容：布置國慶節以後中小學工作。孫國梁發言〉（1959年10月9日），《市委教育部召開區文教書記、部長研究當前教育工作的會議記錄》，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112，頁28-40；40-49。
- ⑥⑯ 〈鄧拓、張文松、孫國梁等同志在市委中小學教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9年8月19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140，頁1-10、33-48。
- ⑥⑰ 〈鄧拓同志召開教育系統負責同志研究提高教育質量、半工半讀問題及張文松同志在小學專業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10月28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113，頁15-26。
- ⑥⑱ 《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鑒（1949-1991）》，頁12；陸定一：〈教學必須改革——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60年4月9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970-73。
- ⑥⑲ 〈文松同志在第一次中小學支部書記會上的報告〉（1960年11月26日），《市委教育部摘錄鄧拓、張文松、卞慎吾等同志在1958-1961年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及該部對中、小學工作的重要指示、通知（1961年市委工作會議檢查時用）》，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211，頁74。
- ⑦⑰ 〈孫國梁同志在高三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10月4日），北京市檔案館，153-001-01001，頁1-2。
- ⑦⑱ 〈張文松同志在教育會議上的發言〉（1959年12月19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115，頁39-53。
- ⑦⑲ 陳楚三：《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迹》（香港：明鏡出版社，2017），頁69-70。
- ⑦⑳ 〈市委教育部整理的關於勞逸安排問題的材料〉（1960年12月1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172，頁51-53。
- ㉑ 〈鄧拓同志在城近郊七個區中小學黨員領導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摘要）〉（1961年4月13日），《市委教育部摘錄鄧拓、張文松、卞慎吾等同志在1958-1961年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及該部對中、小學工作的重要指示、通知（1961年市委工作會議檢查時用）》，頁87-91。
- ㉒ 〈市委教育部對城市中小學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歷次稿）〉（1961年11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228，頁67-78。

- ⑦ 〈張文松、楊伯箴、孫國梁等同志在1962年4月市委擴大會議中學組會議上的發言及中學組討論時提出的意見〉，頁9-22。
- ⑧ 〈北京市教育局黨組關於中小學教育調整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1962年6月4日），載《北京教育檔案文粹》，上冊，頁197-204。
- ⑨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大、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學生進行反修正主義學習的時間安排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63年3月17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頁197。
- ⑩ 〈中共北京市委對市委教育部關於中小學系統開展五反運動和全年工作安排的報告的批示〉（1963年4月11日），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年）》，頁272。
- ⑪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第五中學進行五反運動試點情況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63年6月17日），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年）》，頁380-81。
- ⑫ 〈鄧拓、張文松、卞慎吾、孫國梁等同志在市、區教育部門和城近郊區中學三級幹部會上的報告記錄（缺鄧拓同志報告）〉（1963年7月29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303，頁1-20。
- ⑬ 〈中學領導幹部在1963年10月市委工作會議小組會上對中學教育提的一些意見〉（1963年11月），北京市檔案館，001-023-00271，頁1-8。
- ⑭ 〈主席春節召開座談會〉（1964年2月13日），《上海市教育局整理的全國教育廳局長會議記錄》，上海市檔案館，B105-8-255-1，頁碼不詳。
- ⑮ 〈陸定一同志三月七日在教育廳局長會議上的報告（記錄稿）〉（1964年3月7日），《全國教育廳局長會議資料》，上海市檔案館，B105-8-255-33，頁碼不詳。
- ⑯ 〈關於學校課程的設置、講授和考試問題的批語〉（1964年3月10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3-34。
- ⑰ 〈北京市人民委員會關於北京市各系統局長級幹部任免材料〉（1964年），北京市檔案館，123-001-00931，頁117-18。
- ⑱ 〈教育制度要改革〉（1964年7月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96-97。
- ⑲ 〈關於試行兩種教育制度情況的報告〉（1965年7月26日），北京市檔案館，047-001-00602，頁42。
- ⑳ 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頁37-38。
- ㉑ 〈市高教局、教育局取消主任加班費、師資、學生參加勞動、籌建農大等問題的請示、報告〉（1965年5月6日），北京市檔案館，001-006-02312，頁1-7。
- ㉒ 〈徹底肅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北京日報》，1966年6月20日，第1版。
- ㉓ 〈徹底清算張文松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行〉，《北京日報》，1966年7月29日，第3版。
- ㉔ 北京市教育局師範教材編寫組編：《教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72），頁13；郭曉燕：〈《五四決定》的制定、貫徹與歷經的磨難〉，《北京黨史》，2001年第3期，頁41；〈臭名昭著的「五四決定」和劉鄧黑司令部的黑指示〉，《井岡紅旗（門批改專刊）》，頁19。
- ㉕ 北島、曹一凡、維一主編：《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頁150；胡志濤：〈「八·五」祭——一場史無前例的教育大摧殘〉（1986年），載《愛滿天下 樂育英才》，頁9-16；〈張迅如同志在運動初期的三張大字報〉，《井岡紅旗（門批改專刊）》，頁11-12；張亞平：〈我的父親張迅如〉。

曹子尼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生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